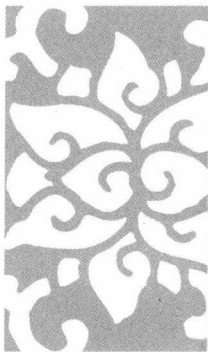


刘锡诚
著

非物质文化遗产： 理论与实践

學苑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 理论与实践

刘锡诚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 / 刘锡诚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77-3356-3

I. 非… II. 刘… III. 文化遗产—文集 IV. K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5566 号

责任编辑：刘 涟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01101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印 刷 厂：保定市华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 × 960 16开 25.5印张

字 数：500千字

版 次：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册

定 价：56.00元

自序

自从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寻求解决保护民间创作的建议并得到了该组织和各会员国的响应并持续给予高度重视以来，保护民间创作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潮流和各国政府的责任。在198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大会上制定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草案》的基础上，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此，作为缔约国之一，中国的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汇入到国际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洪流中。随着政府保护工作的稳步有序地开展和社会认同程度的提高，保护民间文化运动，业已成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民间创作”易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为便于国际交流和对话，我国政府文件中也不再使用“民间文化”这个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本土习惯用语，而接受了国际文件中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的术语及其所包含的理念。理念变迁的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

我国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运动的兴起，把我这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文化人也卷了进来。尽管我已退休多年，但自2002年起，我暂时中断了文学批评与散文随笔的写作和专门课题的研究，重新拣拾起多年前所从事过的民间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学）的行当，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非遗”的保护、考察、咨询和理论探索上。在这一时期，有时是参与讨论制定某个文件、评审申报项目及名录、评审认定传承人、论证某个项目；有时是应邀在一些省市的“非遗”保护中心举办的培训班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等专业机构的学员班授课；有时是为地方的“非

“非遗”项目的申报与保护提供咨询帮助、考察督导。更多的，则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亲身感受和专业经验，从事“非遗”的理论研究，撰写文章，借以宣传“非遗”在民族和文化上的价值以及开展保护工作的意义，希望能为提高公众的“文化自觉”、改进“非遗”理论的滞后局面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非遗”保护工作者的队伍，是由两部分人员组成的：一部分（主力军）是各级文化官员和干部；一部分是民间社团、高校、社科、文艺、中医药等研究机构里的民俗文艺和学术研究者。这两部分人员各有长短，理应取长补短，逐渐整合起来。我很希望置身于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文艺理论家们，带头冲破多年来形成的把文化等同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坚冰。这个坚冰不破，“非遗”的保护工作就难于在真正科学的意义和真正文化的意义上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就难于做好这项关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民族伟业。（当然，现代社会条件下，路障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这一端，工业化和商业化思潮和行为的无孔不入，也许对“非遗”是更大的威胁。）于是，从2003年起，我就在一些能够参加的会议上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一再斗胆地重复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文化研究和“非遗”保护是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上马的，质疑长期以来把文化等同于政治的倾向，建议把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论的指导之下。新华网2006年1月24日就拙文《文化发展和研究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发表社评说：“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21期刊登文章《文化发展和研究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文章指出，在全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方面，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长期以来存在着把文化等同于政治、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理念，如何正确认识文化的发展和嬗变规律十分必要，最基本的一条是在继承中发展，文化研究要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文化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学习时报》的编辑以及新华网的社评，给我的理论探索的肯定和支持，激发了我这个过着闲云野鹤生活的“边缘人”继续参与现实、进行理论

探索的勇气。

几年下来，我陆续写作了几十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和讲演稿。这些文章或讲演稿，都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有些还被文化界和学术界关注过。这些文章的特点，是应“非遗”保护工作的需要而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坐而论道”的学院式的风格，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里的文稿，就是从我的这类文章中遴选出来的。这本书的出版，也许会对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非遗”保护、普查、建档、数据库建设、传承人认定、干部培训，以及似乎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非遗”的学科建设，多少有些参考作用。

学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曾经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华民俗文丛》和《三足乌文丛》两套丛书。该社建社以来，一向为“非遗”保护工作和学科建设推波助澜，为我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世所瞩目。感谢学苑出版社，把我这个选题列入了出版计划，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2009年2月4日立春之日

目 录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1)
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文化的保护·····	(18)
原点：多样性与多样化·····	(29)
文化圈与文化“飞地”·····	(4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	(45)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5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西部为例）·····	(66)
抢救性保护和生态性保护·····	(8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	(89)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	(10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古村落·····	(118)
传承与传承人论·····	(125)
转变理念正当时·····	(151)
对几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题的思考·····	(160)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	(179)
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	(189)
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	(211)
原始艺术及其观念在民间文化中的遗留与影响·····	(221)
整体研究要义·····	(247)
“活态”保护的一种模式·····	(257)

留住我们的文化根脉·····	(26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大关键·····	(272)
基于实践的学理探索·····	(275)
政府主导与专家参与·····	(280)
保持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	(285)
守护精神家园 传承民族文脉·····	(291)
春节：慎终追远 生生不息·····	(298)
清明节的天候和物候·····	(307)
黄石与《端午礼俗史》·····	(317)
民间传说及其保护问题·····	(323)
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命运·····	(339)
“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	(345)
关于“梁祝义（宜）兴说”·····	(368)
略谈白蛇传传说·····	(372)
湮没的文化有待出发·····	(382)
湘西：什么最重要？·····	(385)
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	(389)
蓝夹缬与昆曲的葛藤·····	(392)
大地震后的文化担当·····	(396)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主题词

经济转型 本土文化 文化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批评

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全球化与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问题，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问题，日益成为文化艺术界和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经济转型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深刻变革

在总结改革开放 20 年的前后，文艺理论批评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经历了 20 年的发展变革之后，“新时期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业已结束，一个被称为“后新时期”的时期开始了。开始，我对此论，不大能够接受，也不以为然，认为作为目击者，感到新时期文学仍然“气数未尽”，而在我的观念中，过去的沉痛教训是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了，二者固然无法截然分开，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我们不必再人为地用政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套文学的发展历史。但近十年来，即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文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不管你承认与否，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越发显示出不可阻遏的趋向。对照“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被称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兴起，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既往的看法是否正确。文学艺术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文化（文艺）新现象是什么呢？

（1）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及其在文艺上的种种影响的逐渐消除，高举批判和反思旗帜、在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和以人的解放为思想指南的新时期文学艺术，经过20年的发展演变，已经为多元的文艺格局所取代。回想新时期初期，大家写文章提倡文艺要“多样化”，力求抛弃和彻底消除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艺教条主义和种种思想藩篱，特别是文革时期在强权下形成的文艺作品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局面。“多样化”成为当时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批评家们思想库中的主要法宝之一。而“多样化”这个词汇所标识的，其实是被限定了的，仅限于题材、文体、风格、表现手法、笔法、技法等方面。那时，一旦越过了主流意识形态设定的这个“多样化”的“雷池”，而出现“多元”或“多元化”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就会受到某种指责或批评，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也会以既定的思维定势“守土有责”，把住这个关。“多样化”与“多元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如隔着难于跨越的一道天堑。而如今，“多元化”已经冲破了精神的封锁，闯过了思想的禁区，而成为经济和文化阐释中的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成为一个公认的文艺理论原则了。西方文化研究家创造的“关键词”这个术语，已被我们所吸收并广泛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多元化”这个“关键词”的背后，确也蕴涵着或遮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在其构成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华文化自然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炎黄二帝也好，炎黄蚩三祖也好；喜马拉雅文明也好、黄河文明也好、长江文明也好、辽河文明也好，总之是“一体”中有“多元”（或“多源”）。这一点，尽管文艺界人士关注不多、谈论较少，而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却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从制度的层面上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所有制形式、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化。我们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

会主义国家，但受经济构成多元化的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上当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只要对我们现阶段的文化（文艺）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华文化是由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共同构成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文艺）。

（2）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崛起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左翼文艺人士中曾有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争论，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一批大陆进步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还在以方言文学为题继续进行这个讨论。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为作家们所广泛接受，作家下乡下厂，到火热的群众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创作，直到 60 年代末，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 40 余年的大众化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这说明，大众文艺是我国几代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获得了持续 20 年的相对平稳时期，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和繁荣，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的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一定空间，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变化，外来文化（主要是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在内的美国文化）的大量侵入，在这种社会的和文化内部的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在日益发达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种新的形态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无孔不入。就其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商品，是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从而也必然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创造着和开辟着文化市场，如以公司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期尽快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其形式多样，诸如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印刷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是也。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是它只有在买和卖的商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关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勃兴的深层意义，小说家兼批评家李陀发表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大众文化）不仅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一大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以实现

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两者之间的分界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正是这种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的文化形式，就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① 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与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相联系因而具有商品属性。大众文化不仅夺得了原来通俗文艺和大众文艺的接受者——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老百姓，也夺得了原本属于所谓纯文学和高雅艺术的读者和观赏者的份额，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超越或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为工农兵的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含义，甚至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边界受到了历史性的冲击，并在悄悄地改造着传统文化并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转型和变革。“文学”、“文艺”、“文化”这些概念及其内在含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到中国的文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和所从事的“文学”和“文艺”及其概念的本身，是与19世纪末那些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和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们的筚路蓝缕之功相联系着的。然而，百年之后的今天所出现的新情况，再一次给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提出的挑战，是他们所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得到的。“文学”和“艺术”，乃至“文化”，还能固守得住旧日的老防线吗？

(3) “文化霸权”的丧失和“平等对话”的出现

在一些文化批评文章中常常遇到“文化霸权 (cultural hegemony)”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安东尼奥·葛兰西 (A. Gramsci, 1891 - 1937) 在上世纪中叶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当下我国的文化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们使用这个词汇，来代替汉语中常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据最新的报道，2000 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葛兰西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研究，把历史与哲学、历史与政治看作是同一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对经济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

^① 李陀《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采自：清华大学人文日新网，转自：《世纪中国》2001 年 6 月 18 日。

语系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化（过去翻译为‘一元论’——引者）的格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开放。而且，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也必然回到葛兰西哲学，以此冲决资本主义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① 葛兰西的理论概念使我们在文化（文艺）批评和研究上开阔了视野，就是说，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话的领域，“霸权”的取得和建立，不应也不能是通过政治的或行政的手段，而应通过对话和斗争的手段，“主流意识形态要在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谈判和斗争’中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②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其基本意思我想是相同的，艺术上的和学术上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要通过争鸣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和行政手段。可惜，在很长的岁月里“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能够得以贯彻实行，不得不走了很长很长的弯路。今天在新的环境下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风起云涌，包括某些充满庸俗气味、美化帝王、宣传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剧的流行，一些张扬庸俗世界观和游戏人生的所谓“痞子文学”、一些以暴露女性隐私为卖点的畅销小说，以麦当劳文化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占领，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主流文化（或主旋律文化）共存、对话和竞争（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是“谈判和斗争”）的新格局。在新文化格局中，文学艺术固有的批判品格被大幅度消解，休闲性和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功能空前膨胀；而批判性从来是文学艺术之存在的基本品格，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新的文化构成格局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相对削弱甚至丧失，而要取得这种“霸权”即领导权，靠的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优势，而是蕴涵着深度艺术审美力量和隐蔽着强大意识形态魅力的艺术作品的对抗和竞争。

① 《2000年美国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要》，载：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

② 马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载：《文艺报·文学周刊》2001年11月20日。

（二）文化研究的兴起

在改革开放 20 年后，中国文化出现的新形态和新格局，为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批评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有人指出，我国今天的文化环境，与上世纪 70 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形态十分相似，而当时西方的那种文化环境，曾孕育和催生了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 90 年代我国的文化环境下，被引进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来，力图以此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学批评为文化批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倡导者们还主要是一些西方文学翻译者、研究者、教授等学院派的学者，也有个别没有外国文学背景而早就从事创作或批评的人。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在文学批评出现式微迹象的 90 年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文化的因素引进文学批评中来，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引进文学批评中来，的确有益于丰富日渐变得僵化了的传统文学批评的手段。

什么叫“文化研究”？有很多种可供选择的答案。下面让我来引用其中的两个。

其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张平功先生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写道：“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赛义德·艾哈迈德、霍米·巴巴等人物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判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①

^① 张平功《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载：《东南学术》2000 年第 6 期。

其二，主持美国费正清中心“文化研究工作坊”的华裔学者李欧梵说：“美国的当代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那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的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觉得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太大，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就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后来有一个从中美来的黑人，叫斯蒂瓦特·豪（Hall）。”“他们是新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他们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消费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后者主要指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①

其实，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是自今日始，也不陌生。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一些介绍，如卢卡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就是从1956年起，在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邵荃麟同志的主持下，由邵荃麟、冯至、陈冰夷等同志领导确定选题，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大批著作，并由《译文》杂志社内部出版了白皮书。但那时是供研究批判之用的。那个年代，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苏联革命领袖的理论和思想，以及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那些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契在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当然，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名义下出版了两卷本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在前言中也历数了这段历史。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是初步的，标明“限国内发行”的字样，表示我们是不赞成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对西方的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

① 李欧梵、汪晖《什么是“文化研究”》，采自：清华大学人文日新网，转自：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06月18日。

义者的文化理论，从80年代起再次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些，也开始以新的立场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如哲学研究所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版）及《续集》（三联书店1983年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当前在我们这里很热门的威廉姆斯等也做了评介。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宪、罗务恒、戴耘编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不仅收入了当代比较著名的西方文化理论著作（节译），也翻译了雷蒙德·威廉姆斯著名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的一部分，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而且明显看出编者们的意在建构名为“艺术文化学”的新学科。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陆梅林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入了西方各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其中有威廉姆斯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于70年代）中的几个章节和《长期革命》（写于1961年）的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等等。据报纸消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王宁主编的文集《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8日）已经发表了他为此书写的长篇序言。由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目前我国的文化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嬗变，而文化研究却仍然主要是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开展，对大多数文学评论家来说，还难免不是隔岸观火，感到陌生和好玩，笔者期望这部书的出版，能对西方文化理论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起步很迟。戴锦华教授说：“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于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是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

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须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① 尽管戴先生对我国文化研究的诗意的描述很令人鼓舞，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如不能照搬照套外国人的什么“元话语”，不能拜倒在外国人的“范式”脚下而要有创新的精神，等等，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上，压根儿谈不上“已经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做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只是表现出了某些创新的意图——如拓展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内容，引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方法，但还谈不上在中国的文化（即使是当代文化）研究上已经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得到多数研究者或批评家认同了的创新成果。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来判断，当下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充其量还停留在约略地介绍外国人的理论原则和企图构建作者自己想象中的文化理论框架上，而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繁复、多样、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则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考察（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也是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工作模式）、分析和把握。有的论者说，我们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国际接轨了，甚至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好评。我对此论还难于苟同。文化研究这个命题的提出，是敏锐的、适时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把问题的提出当成问题的终结。

（三）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独特性

我们今天毕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现实地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过程涉及一切重要的领域，不限于经济。李慎之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起来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

^① 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与现实关照》，载：《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